

从几出曹操戏比较艺术真实 与历史真实

李谷鸣

提要 本文从几出曹操戏来比较艺术上的真实与历史上的真实,认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艺术上的曹操是反面典型而历史上的曹操是正面形象,艺术上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既有不符之处,也有基本相同之处,艺术上的曹操并非一概是坏典型,也有具有歌颂性质的曹操戏。曹操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同性格的定向性、一贯性相统一,它 just 使艺术上的曹操形象具有多种面貌。

关于曹操问题的讨论,在五十年代,由郭沫若同志发起,曾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尽管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但对于曹操的评价,并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其根本原因在于,曹操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着历史上与艺术上不同曹操。一般认为历史上的曹操是正面人物,应当肯定,应当赞扬,而艺术上的曹操是反面典型,应当否定,应当批判。评论者所选的角度不同,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使讨论无法继续深入。本文拟从几出曹操戏入手,比较历史上的曹操与艺术上的曹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求得对曹操的正确评价,还其本来面目。本文作为引王之砖,难免有不妥之处,期望得到学术界的指正。

一、艺术与历史不符的戏

从一些曹操戏来看,确实存在艺术的曹操不同于历史的曹操的情况,也确实是艺术的曹操否定、歪曲了历史的曹操,鲁迅在1927年9月写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们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艺术与历史不符,应该以历史为依据,以历史上的曹操纠正艺术上的曹操,还曹操的本来面目。

《捉放曹》是一出传统京剧剧目。其故事情节在史书上本来就有不同的记载。陈寿《三国志·武帝纪》载:“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这里既未讲刺董卓事,亦未记县令姓名,同时未提杀吕伯奢事。晋王沈《魏书》载:“太祖以卓终覆败,遂不就拜,逃还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曹操在被劫掠的情况下杀人,属于正当防卫性质。然而《三国志·裴

注》引《世语》云:“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已,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又引东晋孙盛《杂记》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已,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裴注所引的这两种记载与《魏书》的记载完全不同,按《魏书》所记属于正当防卫性质,对曹操无可指责;而这两种记载则讲曹操疑心太重,有意杀人,暴露了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残酷本性。《三国演义》的作者不用前两种史籍材料,而在本书第四回选用这两种近似传说的记载,还把“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改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添进了“闻磨刀之声而起疑”的情节。为了斩草除根,并让曹操在路上杀了沽酒回来的吕伯奢,弃官跟随他的原县令陈宫因此离他而去。《捉放曹》剧情完全依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只是有的同“演义”一样,在路上杀沽酒回来的吕伯奢,有的是让吕伯奢亲自磨刀霍霍,要杀猪宰羊,因而引起曹操疑心,先杀吕伯奢,后杀全家。利用戏曲可以一个人专场演唱,由陈宫用演唱表现了他悔恨交加的心情,后悔自己看错了人,错把一个疑心大、杀人不眨眼的奸贼,当成了正人君子。按照史料价值最高的《三国志》记载,并未提到吕伯奢其人,那末陈宫这一顿骂,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按照《魏书》的记录,曹操遭到劫掠时能把穷凶极恶的劫掠者斩尽杀绝,不愧英雄本色。可是如果象《杂记》所说,曹操则成了极端利己主义者和多疑善忌、残酷暴虐的杀人魔王。这两种记载究竟那一种正确,符合历史事实?从时间上看,这两种记载《魏书》为西晋人写,《杂记》为东晋人写,《魏书》在前,《杂记》在后;从性质上来看,《魏书》大致属于历史范围,《杂记》则多系传说。《魏书》的史料价值高于《杂记》,两相比较,我们应该相信《魏书》。

《徐母骂曹》又名《徐母失策》、《徐母训子》,是京剧老旦戏。其题材源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在樊闻之(曹军来征),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

曹公所遣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曹操捉住徐母、徐庶投奔曹营是事实，但他并未利用徐母要挟徐庶。小说与戏曲脱离正史，讲曹操为了把刘备手下的军师徐庶搞到手，绞尽了脑汁，和谋臣程昱计议后，派人把徐母骗到营地，用各种手段诱惑她，劝她写信给徐庶，要徐庶弃刘归曹。结果遭到徐母的辱骂，徐母还举起砚台把曹砸得狼狈不堪，一怒之下，曹操要杀徐母，经程昱再三相劝才阻住曹操，程昱使用种种手段拉拢徐母，骗取了她的手迹，伪造一封假信星夜送给徐庶，这就是徐母失策。当徐庶得信向刘备辞归时，尽管刘备当时只有徐庶这样一位军师（实际上当时诸葛亮已归备），但他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对徐庶哭着说：“子母乃天性之亲，元直无以备为念。待与老夫人相见之后，或者再得奉教。”其间孙乾曾献计，苦留住徐庶，切勿放去，使曹操斩其母，从而使徐庶为报母仇而力攻操。刘备即严词拒绝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这里以刘备的大仁大义反衬曹操的不仁不义，体现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徐庶被骗到曹操处后，徐母恼羞成怒，大骂徐庶这个孝子：“在刘备处，得其主矣，忠孝不能两全，你为何轻易受骗。”全剧以徐母悬梁自尽的结局来反衬曹操的阴险毒辣。戏中极力美化徐母的“刚强烈性”，通过她的口，大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把曹操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骂遍了。曹操挨骂挨砸都忍住了，一心一意想得到徐庶：“只为徐庶擎天手，忍受徐母击视仇。”根据上述史料，既没有记载徐母受骗事，曹操也未把徐庶当作擎天柱用过。因而“徐母骂曹”也就不存在了。

曹操在用人方面打破了豪门士族的小圈子，坚持“唯才是举”、“用人唯贤”、“猛将必拔于卒伍”的用人方针，还提出用人“不拘品行”。他的那首“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短歌行》，难道不正是一个求贤若渴的创业者向他周围发出动人心弦的“求偶讯号”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要象周公那样礼贤下士，成就他的“周文王事业”。他把大批出身庶族寒门而有真才实学的人罗致到自己手下，加以任用，造成“文武并用，英雄毕力”的盛况。曹操并未通过奸诈手段，定暗计，设陷阱，以收罗天才奇才，《徐母骂曹》明显地歪曲了曹操的用人方针。

元杂剧中无名氏《关云长千里独行》一剧，在后来舞台上曾改为《过关斩将》、《古城会》等名目上演。此剧的史料很简单，《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五年春正月，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关羽亡归刘备。”史书上还说他被俘后，极受曹操优礼，封汉寿亭侯。《三国演义》以此敷衍成生动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并将正史所说的“极受优礼具体化，表现了曹操的宽宏大度，而元杂剧《千里独行》则违反了历史事实，歪曲了曹操形象，主要表现他的奸诈

阴险。他千方百计气落关羽不遂，就起了杀关羽之心。”“擒住云长必杀坏，方显曹操智谋高。”他用了下马、递酒、赐袍三计，必欲置关羽死地而后快，这与《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钱行与赐袍出于一片真心完全背道而驰。在对待关羽归刘这件事上，正史与小说都明言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王霸之度，爱将之意，而《千里独行》却集中表现曹操的阴险奸诈，”充分展现了艺术与历史的不符。

二、艺术与历史基本相同的戏

综观各种曹操戏，有的是艺术与历史不符，有的是艺术与历史基本相同，艺术与历史基本相同的戏，多从反面来评估曹操，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从而对曹操作出正确的评价。

《击鼓骂曹》一名《群臣宴》。旧本有《长亭》一折，另名《东郊送衡》。故事源于《三国演义》第23回，据正史本传，祢衡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性刚傲物。曹操欲见之，衡自称狂病，不肯往。操乃召为鼓吏，大会宾客，欲当从辱衡，反为衡所辱，操怒，遣送荆州刘表。复不合，转送江夏太守黄祖，终被杀。《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曰：“孔融数荐（孔有《荐祢衡表》）衡于太祖，……衡乃当太祖前，以次脱衣，裸身而立。”“衡著布单衣，疏巾履，坐太祖营门外，以杖捶地，数骂太祖。”小说、戏曲与正史的记载基本上是吻合的，戏曲更突出了骂曹，认为曹操要他祢衡为鼓吏是“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孔子”，称曹操为“上欺天子下压群僚”胸怀篡逆的汉贼，极力以形象把曹操描绘为一个奸诈的人。连曹操原姓夏侯不姓曹也不放过：“他本是夏侯子，过继了姓曹，到如今，忘记了宗桃。”剧中把祢衡塑造造成很有骨气的硬汉子，体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早期传奇明徐渭《四声猿》中有《狂鼓吏》一折，也是敷衍《三国演义》中祢衡裸体击鼓骂曹的故事而成，但把时间改为曹操死后，场所改为阴间，由判官主持，让他们扮演原来的身份，演旧日骂座光景，这一改动的意义，是让祢衡有更多可骂的内容，众头骂到尾。

祢衡是由孔融推荐的，祢衡骂曹，透露出孔融与曹操的矛盾。《后汉书·孔融传》所列曹操杀孔融的罪状，其中就有一条与祢衡有关：“又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曹操为什么要杀孔融，并借刀杀祢衡？并不仅仅限于上述内容。最关键的一条，是他们不支持曹操的代汉与实现文王事业，坚持要复兴汉室。孔融《王畿议》上奏：“宜准古王畿之制”，主张“千里以内，不以封建诸侯”，意即尊崇天子，扩大汉室实权，明确与曹操实行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相抵牾，这是曹操最不能容忍的。祢衡从多方面骂曹，曹操最忌恨的是骂他“上欺天子下压群僚”、“胸怀篡逆”。曹操以此为用人标准，支持他的“文王事业”的人，即使骂他为“阉竖遗丑”

的陈琳也被用作亲随书记;对他代汉有异议,即使是他最为亲信的谋士如荀彧也迫使其自杀。对于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曹操杀孔融、借刀杀祢衡,即使残酷无情,也不能否定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

《让徐州》一剧依据《三国演义》的“陶恭祖三让徐州”写成,陶谦为何要将徐州牧这一显赫要职拱手让人,主要是他挡不住来自曹操方面的强大压力。《三国志·武帝纪》载:“太祖征陶谦,下十馀城,谦守城不敢出。兴平元年(194)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雒,董卓之乱,避难琅玕,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郟,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郟东,要太祖。太祖破击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杀戮。……陶谦死,刘备代之。”《让徐州》一剧是在曹兵不断犯境、大敌当前、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陶谦借口自己体衰多病,二子年幼,要把州牧的位置让给刘备,刘备不愿接受,一连让了三次,最后由于陶谦病危,刘备才接受。曹操曾被认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以“哀伤”的心情描写人民的苦难,蕴含着他对人民的同情,如《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虬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曹操用兵于徐州来看,他对人民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而且任意杀戮,是人民灾难的制造者。前引正史资料,已讲明曹军”所过多所杀戮”。范晔《后汉书陶谦传》写这次战役更具体:“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拔取兖、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生于三国时代的陆机《辨亡论》说:“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从上述史料来看,《三国演义》写曹操攻打陶谦时,“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写得并不过分,并不违背历史的真实。由此是不是可以断定曹操的人道主义是假的是骗人的呢?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北方各地军阀割据,相互间不断混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城市残破,农村荒芜。不消灭割据的军阀,不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的民族就不能生存下去,要消灭割据的军阀,即使最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也必须通过战争手段,而战争本身就是残酷无情的,就是要杀人的,因而曹操向军阀开战,不能说他没有人道主义,他消灭了军阀,统一了北方,也就为在北方推行人道主义创造了条件。

《消遥津》又称《白逼官》,主要是表现曹操“白逼”后事。《三国志·武帝纪》载:(214)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瞒传》和张番《汉纪》也曾记载:三种史籍所载情况虽有不同,但杀伏后的基本事实一样。《三国演义》第66回与本戏依据史书安排了情节:汉献帝刘协看曹操权势日重,心中惴惴不安,于是与伏后计议,派内侍穆顺给后父伏完送去血诏,叮嘱密约孙权,刘备作为

外应,以便铲除曹操,曹操得知后,严守宫门,从内侍发髻中搜出伏完密书,带剑入宫,又命华歆入宫,将伏后乱棒打死,鸩杀了伏后所生的两个皇子,斩了穆顺及伏完全家。曹操绞杀伏后,汉献帝一面愤恨曹操的横暴与自己的懦弱。另一方面又慨叹两个幼子,不但不能给母亲报仇,而且随时有被曹操杀害的可能。刘协也因此使后人洒下了同情之泪,曹操的残暴行为却被后世所骂。唐太宗《祭魏武帝文》说:“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乘钧国之情,有无君之迹。”

以汉献帝为象征的东汉王朝,由于受到黄巾大起义的冲击和军阀连年混战,早已名存实亡,而徒有皇帝之名的汉献帝在建安元年(169)为曹操所接去,成为他既定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工具。然而汉献帝并非平庸之辈,据袁山松《后汉书》说:“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薄万里之衢,萍流蓬围,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他不甘心充当工具,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政变,企图扼杀曹操,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皇帝。如果让汉献帝得逞,他个人的才智远不及曹操,更没有象曹操那样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势必不能统一祖国的北方,安定人民的生活,因此,从历史的发展与人民的利益来看,我们只能选择曹操,而不能选择汉献帝。

三、具有歌颂性质的戏

曹操戏,也有歌颂性质的。《白门楼》是一出京剧小生唱工戏。故事源于《三国志·武帝纪》:“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公东征布,攻之不下。时公连战,士卒罢,欲还,用荀攸、郭嘉计,遂决泗、沂水以灌城。月馀,布将宋宪、魏续等执陈宫,举城降,生禽布、宫,皆杀之。”这一段历史记载,与《三国演义》的情节基本吻合,剧本是依据小说改编的,只是对吕布这个舞台形象的处理有些不够恰当。剧本把吕布描绘成年轻骁勇的“英豪”,由于好酒贪色,偶然被曹操施连环计所中,因而被生擒。这在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是一次重要的战役,剧本不管怎样骂曹操,曹操毕竟是胜利者,吕布是失败者,这无疑是对曹操的肯定与赞颂。

《战宛城》中《割发代首》一折,源于《曹瞒传》。《三国演义》使这一史实更具体、更形象化,并增加了新的情节,曹操先是要拔剑自刎,割发后,就叫人立即将头发传示三军,宣布“丞相践麦,本当斩首,今割发以代”,命令一下,将士们个个敬佩。剧本系根据《三国演义》敷衍而成。有人认为曹操“割发代首”表现了他的变诈本性,因而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曹操下令大部队行军不得践踏群众麦田,犯者处以重刑,这本身既说明曹操部队的纪律严明,也表现他对人民的爱护。曹操“割发代首”的目的,也在于维护法令的严肃性。从总的方面来说,体现了曹操的法治精神,他在《以高柔为理曹椽令》中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把推行法治,作为匡治时弊的良方。他对部下、对家人,都实行严刑峻

法。曹植妻衣绣,违反了家令,被勒令自裁。“割发代首”是他在法律面前以身作则的表现。由此可见,从总的倾向来说,此剧是歌颂曹操,而不是贬斥曹操。

四、展现曹操多种面貌的《赤壁鏖兵》

《赤壁鏖兵》又称《全部三国志》,为大型连台本戏,包括《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借东风》、《火烧战船》、《华容道》等许多折子戏。赤壁之战是决定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关键性的一役,小说作者进行了详细的铺排,从四十二回后半回写起,一直写到五十回才告结束,前后用了八回半的篇幅。正史记载这段故事既简略,各种史籍之间又有矛盾。《三国志·武帝纪》载:“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嘉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吴主传》载:“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又《江表传》载:“(曹操)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以上史料有的只讲疫病流行,有的讲曹方自己放火烧船,皆未提火攻事。然《山阳公载记》则称:“公船艄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这里讲到火攻,但在时机掌握上迟了一点。《周瑜传》则言之甚明:‘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艄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放火。时风迅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记载了曹操自己放火烧船的《江表传》,同时又详载火攻情况:“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许,同时放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寨。瑜等率轻锐寻经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了败仗,这是历史事实。但曹操是这场战斗中的关键人物,开始他亲率八十三万大军沿江而下,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洒临江,横槊赋诗,投鞭可以断流,具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然而被火攻后,他成了孙刘联军追逐的目标。小说把光束集中在他身上,通过他的败逃带领我们对整个战场作一次巡回,通过他败逃的过程来艺术地概括实际战斗的历程。败逃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东吴战场,第一关避开黄盖,第二关闯出吕蒙和凌统的堵

击,又遇甘宁、太史慈、陆逊的追杀,才离虎穴,又入龙潭,三战三脱。第二阶段,逃离了东吴战场,又逃进了诸葛亮的伏击圈,三次大笑,三困三脱,一笑杀出了赵子龙,二笑引出了张翼德,三笑在华容道遇见了关云长,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最后靠了求饶才逃得性命。曹操象一个喜剧演员一样,一次次自作聪明的大笑,又一次次当众出丑,作者就是这样以戏剧性的情节,带有幽默感的笔触,对曹操进行了有趣的嘲讽。败军之将反面笑话处于胜利者地位的对手,似乎有些反常,令人费解,然而这又恰恰符合人物的性格。打了败仗的还是那样雄心勃勃,不屈服于逆境。曹操的笑往往不同于常人。当年董卓弄权时,满朝公卿哭泣,唯独他大笑,这笑是具有精神力量的表示。眼前,他虽然惨败了,但败而不馁,仍然要强,偏要找出破绽,嘲笑对手,“毕竟智谋不足”“到底无能之辈”,这可以说是从正面表现曹操的形象。赤壁火起,乌林溃逃,他是那样惊恐,以后忽笑,忽喜,忽怒,都有其心理根据和策略需要,华容道上,刚刚笑话对手“无智”“无能”,突然杀出了关云长,他随即转脸低声下气地求饶,并用所谓“春秋之义”打动关云长,充分表现了他那老谋深算、诡谲多变的性格。打了败仗后,他的处境很危险,稍有不慎,不被人杀,也会失去对内部的控制力。笑何尝不是为了鼓舞士气、安定军心,这对曹操的临难应变能力又是一种肯定。华容道上,遇泥泞,道不通,操令军士担柴填塞,此时军已饿乏,众既倒地,操喝令人马践踏而行,死者不可胜数,号哭之声,于路不绝,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斩!”三停人马一停落后,一停填了沟壑,一停跟随曹操,曹操就是这样一颗心毒手辣,忍心要践踏士兵的身体过沟壑、再大的痛苦也不准哭喊、随时叫许多人为他去死、他心灵不会颤抖的凶悍的指挥官,充分展现了他的残酷本性。大型连台本戏《赤壁鏖兵》使人们看到性格复杂展现多种面貌的曹操。

综合上述,从几出曹操戏来比较艺术上的真实与历史上的真实,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艺术上的曹操是反面典型历史上的曹操是正面形象,艺术上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既有不符之处,也有基本相同之处,应该说艺术上的曹操并非一概是坏典型,也有歌颂性的曹操戏。曹操性格复杂,具有多种面貌。倒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写得最好,把曹操形象塑造得极其丰富、极其复杂,完全符合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曹操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同性格的定向性、一贯性的统一,才能真正符合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份,单一化的曹操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人物的真实。

(责任编辑 万直纯)